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

从以夷为师到融合创生

——文学的中国式现代化变迁

□刘大先

“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特点在于强调本土美学传统、文化自觉和现实关切,尤其是价值观念上的独立创造

社会历史实践决定了文学的起伏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经常被人提及的一个问题是:艺术生产的发展与物质生产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马克思以史诗为例指出:“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如同庄桂成晚近的研究表明,这种社会与文艺之间的不平衡只是微观的不平衡,从长时段来看,两者在宏观的总体性上是平衡的。比如18、19世纪英、法等国家,文艺复兴与经济贸易及后来的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提高,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与资本主义的发达之间彼此是互为促进的。

这涉及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问题,置诸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来看,情形更为明显。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确立、嬗变与更新,内在于这个历程之中,同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的进程关联在一起,成为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时势与人之间的互动,历史实践本身决定了文学的起伏。

尽管在后见之明中,人们常用现代化来回溯式地追述总结历史,但其本非中国本土自生的概念与观念,而是伴随19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民族主义扩散和殖民主义入侵而兴起的观念,原先在东亚区域循着自身路径前行的王朝帝国被迫重构自己的观念系统,此前同域外交流的模式发生改变,从想象中无远弗届的独步“天下”进入到“万国”竞争的国际环境之中。因为西方的技术、军事、商业的强力,源自于欧洲的地方性成为一种全球性,全球的地理与权势版图被改写,相应地带来欧洲之外地方在文化、观念和价值上的重塑。广义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化由此启动,近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带来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变迁也有一个艰难建立自身主体性,并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从历时的文学史分期来说,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在历史叙述中形成了生物式的生长递进隐喻,代际划分从来也不是日历时间,而是因为秉持了不同的理念;就文学观念来说,中国外来在译介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过程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改造古典文学,并发明创生了现代中国“新文学”,并且在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过程之中,结合本土实际,形成了“人民的文艺”的理念和实践;从文学形式与技巧来说,广泛将古今中西的遗产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式传承与扬弃,不仅有效继承与创新了文人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同时打捞并汲取了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类民间口头文学,更因应时势,在电子媒介时代引导并壮大了网络文学的发展。

基于此,中国文学实现了对传统士大夫精英古典文学和以个人为中心的现代西方文学的双重超越,走上了继往开来、守正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一条独立自主的探索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

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文学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正是这样一条独立自主的探索之路,是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凝聚在一起开辟出来的。

如果将近现代联结一起,那么近代文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一个“过渡时代”的文学,本土既有的美学观念、格调趣味与文学形式,同外来形形色色的文学颇颇辩论,无论是时务派还是“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与实践者,无论从技法到观念,都处于交织、杂乱、浑沌的状态。从早期“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向“泰西”的转换,意味着传统文学理念在那一个时期的节节败退,西方现代文学观念逐渐取代本土的观念,进而成为一种标准。近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是一种“单向街”式的输入、模仿和学习的过程,特别是早期的现代化某种程度上化约为“西方化”,可以视为试图在“以夷为师”基础上进行“文化战”,固然“西方”本身充满了异质和多元,但在文明论立场上它们是作为整体的面目出现的。

内外情境的交叠,带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文学天才“成群地来”的现象,在经典理论家和作家的示范性作品中,现代文学得以确立其基本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及西方内部思想的反思,加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冲击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传入,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利所暴露出来的强权现实,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强权国家与文学史所主导的“世界主义”迷思中觉醒,进而使得民族主义激进化,反过来刺激了依循西方化语法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诞生。尽管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团体内部也同样充满复杂的张力与斗争,然而让“现代文学”得以确立的无疑是关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性思路,在主流的文学思潮中,“中”与“西”则成为“传统”与“现代”的换算。即便是摆脱了“欧风美雨”的“以俄为师”,从逻辑上来说也只是“以夷为师”的升级版。

不过,随着社会主义的传入,开始突破了资本主义国家所垄断的“现代化”解释权,用李大钊的话来说“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而不是跟随某些先发达国家之后亦步亦趋,当“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成为先锋,科学的社会化、文化的平民化指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时,国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文学成为一种追求,也让曾经一度处于被压抑和遮蔽的底层、民间和少数族群的文化的地位有意识地得以提升。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接受者,更多秉持的理念是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在以“立人”为主导的现代文学观念中,这不啻为“人”的扩张,“个人”开始向“人民”发展。

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末,陈独秀已经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不是人民的民主,而20世纪的民主应该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根据马克思学说的组织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党,作为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成为历史的选择,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开启了此后共产党人的政治与文化。民主与科学是底色,但囿于国内军阀混战、政党政治之争,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侵等多种因素,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与道德则无暇顾及,这就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五四时期提出的“穆勒尔姑娘”(道德)在文学中的反映,也更多停留在打破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束缚之上。

在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中,对于“启蒙”的理解发生了深化,从单人的“盗火者”情结,即从西方取得现代化真经的思路,转向了立足于本土精英传统和民间文化的实际,以及同西方文化的结合。“启蒙”从单向度的精英自上而下的教化,转成了自上而下与广大民众自下而上相结

合的互相教育的过程。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现代化走向其中国式路径的尝试。在文学中的体现,就是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到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此后共产党人一系列的改革与尝试,最终凝聚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确立的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论述。

以人民的福祉为目的

“当代文学”在一般文学史叙述中,其关键性节点被放置在政治史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间开始了”。如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路中,那它则可以前移到1942年。但是,确立某个明确的开端是一种神话,因为历史的进程并不是那么清晰明朗、斩钉截铁,在具有较强稳定性的精神文化层面更是如此。与外在的技术器物生产和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规定性的组织制度创造之外,文艺的生产创造往往无法一蹴而就,而有着顽固的惯性。因而,在社会主义新文艺、新文化和新人的重铸中,会发生形形色色的涸流、僵化和过激举措,挫折与创伤作为历史之恶难以避免,也无需回避,直面教训是为了提供镜鉴。

当代文学的最大理论贡献,是“人民文艺”的生成。这不仅仅是“人民”作为历史主体从政治理念中的移植,更是在历史与现实基础上融合中西方经验的创新,它的“文艺”突破了现代“纯文学”的自律观念,既保留了经历曲折而典型的现代文学观,同时也将原本被侮辱与被损害民众的口头文学纳入进来,用制度化方式进行作家教育和作品修改,组织群众文学生活,让个人创作与集体创作并行,这是真正的“人民文学”。它同1954至1965年间形成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宏伟目标是相互配合与成就的,不能简单地在“工具论”中将其狭隘化,因为文学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途径就是理念先行,就如同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是先取得先进性文化的领导权一样,现代文学是观念先于实践的。尽管其演进的过程中因为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发展而出现了挫折,在“新时期话语”中重新经历了新的“欧风美雨”的洗礼,但此路这一路径已经迥异于五四时代——社会主义人民文学作为一种遗产,渗透在新的“西化”过程内部,并且一度在对弱小民族的关注和与第三世界人民文学的结盟中(如亚非作家会议和莲花奖),输出了自己的价值观。

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文化自信日益得到张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巩固,中国文学也走出了西方文学话语,并且在具有通约性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上做出了独特的价值上的创造。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继承与融合了中西方古典文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动态现实观察与应对的结果,逐渐在探索中找到自己的道路。这个探索过程总是与社会现实语境密切相关,是整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代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趋于自觉,中国式现代化是整体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国防的全面现代化,是基于中国悠久历史的持续奋斗,中国的生动现实实践的新型道路,改写了西方先发达国家长期垄断的现代化的定义。“新时代”中国文学超克了“新时期”以降的个人主义又吸收了文化多元主义的部分合理性,其特点在于强调本土美学传统、文化自觉和现实关切,尤其是价值观念上的独立创造,也就是说开始从“单行道”走上“双行道”,从“以夷为师”走上融合创生。文学的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世界主义的幻想,隐含着民族主义的内涵,同时有着国际主义的视野,以中国大地的现实人、物、事为起点,以人民的福祉为目的,而指向于全人类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综述

10月22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中国传媒大学主办、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基地承办的重温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树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徐粤春,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守训,中国传媒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基地主任张晶,以及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张树庭在致辞中说,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十年来,文艺界深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时代生活、展现人民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举办此次研讨会,旨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实际行动助推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

徐粤春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为新时代文艺事业锚定了价值航向,擘画了宏伟蓝图。十年来,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自觉担负新的文化使命,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展示中国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书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新气象。面向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强历史主动精神,加强对新时代文艺规律性的认识、总结和把握。

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张晶认为,中国精神在文艺领域的表现就是中华美学精神。《讲话》强调的三个“讲求”,最集中地呈现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精髓。其中,“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是审美运思的独特方式,“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是审美表现的独特方式,“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是作品存在的独特方式。“中华美学精神”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今天。我们需要将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开展新的文艺创造,凝聚磅礴发展力量,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王一川说,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中国文艺创作涌现出三种比较突出的新美质:取之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古雅美质,取之于现代革命文化资源的壮丽美质,以及取之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的喜悲融正美质。这些美质的生成及其不同表现透露出中国文艺的丰富性,也由此让人对于不断发展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产生了新的想象和憧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吴子林说,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文艺思想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强的贯穿性。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我们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体到文论界,需要对丰富的传统文论资源进行再阐释,不断激活其时代活力。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智锋表示,文艺事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具体说来,要秉持人民情怀,抒发人民情感,塑造人民形象,满足人民需要。在文艺实践中,我们需要深入生活,写出真实反映现实、能够温暖人心的作品,并通过多样的传播形式使优秀作品抵达广大受众。山东大学教授范玉刚说,在新时代,文艺被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格外突出的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新时代文艺创作生产的重要原则。新时代文艺要进一步健全创作体系、产业体系,进一步建构波澜壮阔的文艺气象、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

新的时代,需要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对于文论界而言,需要积极构建自主的文论话语体系。浙江大学教授王杰说,推进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抉择。在这一进程中,“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并基于现实发展进行新的开拓,是创造新的文化的重要路径和手段。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德胜认为,构建自主的文论话语体系,应该坚守中国本位,立足中国文艺的历史和当下、传统和现实,推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等。这需要我们打通古今中外,找到各种话语资源的内在一致性。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段吉方认为,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进程中,要聚焦中国的现实、中国的问题、中国的语境,从文艺实践中提炼出标识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同时,中国文艺评论话语的自主建构还应展现文明互鉴的意义和价值,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新时代文艺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强化党的文化领导权。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友军表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这种建构,既需要实体层面的建设,更需要文化层面的阐释,这需要理论工作者进行更加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戏文系主任李胜利表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现,需要我们创造出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为时代立传、为时代画像、为时代明德。近十年来,在文艺领域,涌现了很多优秀的主旋律作品,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这些作品与时代同频共振,以人民美学铸造时代灵魂,以独特的方式讲好了中国故事,提升了国际传播效果。

进一步构建自主的文论话语体系

□本报记者 黄尚恩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理论研讨会

陕西举行青年作家代表座谈会

本报讯 为学习贯彻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精神,探讨夯实青年文学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路举措,陕西青年作家代表座谈会日前在西安举行。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单红,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副主席阎安出席并讲话。陕西省作协创联部主任、青创会陕西代表团团长阎晓东传达了此次全国青创会的相关情况,重温了会议内容和主要精神。

座谈会上,10余名代表先后发言。单红表示,陕西省作协将充分利用现有的一系列机制措施,不断健全完善创新青年作家培养工作机制,继续加强对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等新兴青年文学群体的凝聚引导;积极发挥《延河》《小说评论》和“文学陕军”微信公众号等一系列文学平台的作用,广泛发现、努力托举新人;加强省内外、国内外文化交流,推动青年作家作品“走出去”,为青年作家成长进步营造良好氛围。贾平凹表示,希望青年作家可以立大志、多创新,“要和以前不一样,也要和周围人不一样”。阎安谈到,陕西青年作家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文学定位、文体定位,保持个性的穿透力。

专家共议版权运用与保护

本报讯(记者 刘鹏波) 近日,第十三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加强版权运用和保护,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京举行。论坛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主办。来自版权领域的专家学者、产业界人士及法律实务者与会,共同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版权立法、版权集体管理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版权产业的影响等议题。

大家一致认为,加强版权运用与保护,对于激发创新活力、规范市场秩序、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能和作用需要被广泛认可,应通过完善版权立法和政策,提高版权管理组织的服务能力,以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解玺璋新作探寻“隐藏的文脉”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解玺璋新作《隐藏的文脉:北京书院述微》研讨会在京举行。作为“文学京彩季——北京作家2024精品研推工程”第二期,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作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承办。北京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赖洪波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北京作协副会长周敏主持,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担任学术主持。

《隐藏的文脉:北京书院述微》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历史文化随笔的形式,以14个书院为主体,深入挖掘与其营造和建设相关的人和事,为曾经对北京文化建设作出贡献的一代代文人士大夫立传。与会者从研究手法、写作风格、思想内涵、历史文化价值等多个维度对该书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谈到,作者通过大量文献和实地考察,重新发现了书院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阐明了书院在教化民俗、人格塑造等方面作用,为北京文化研究留存了重要史料,体现出了丰厚的人文情怀和使命担当。

第六届全国赵树理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太原师范学院主办,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承办的第六届全国赵树理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山西太原举行。太原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马杰,山西省文联主席葛水平、省作协原主席杜学文,中国作协社联部副主任丰玉波以及温建生、邢小利、傅建安、胡永强等专家学者参会并致辞,近百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会议开幕式由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杨占平主持。

此次研讨会旨在全面总结新世纪以来赵树理研究的新成果,探讨赵树理研究的多元视角与方法,推动赵树理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赵魁元、赵勇、刘旭、雷鸣、王龙洋、林培源等学者作主题发言,傅书华、王春林等主持并进行评议。与会学者围绕赵树理研究的历史性回顾、赵树理小说与根据地文化、“赵树理方向”与“赵树理现象”评价、国际视野下的赵树理研究、乡村振兴与赵树理研究的新趋势、赵树理重要作品的重新解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大家认为,在今后的创作和研究中,要继续深入学习赵树理的文艺观念,挖掘他的思想内涵,发扬他的创作精神,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推出更多记录时代变迁、表达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

河北举办《最后一站》研讨会

本报讯 近日,由河北省老干部局主办,邢台市老干部局、威县县委县政府承办,河北省老科协、河北省作协、河北省林草局协办的苏有郎中篇报告文学《最后一站》研讨会在河北省邢台市威县举行。4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最后一站》刊发于2024年《中国作家》第7期,生动讲述了退休老干部、果林专家曲宪忠

退休不退志,把全部心血奉献给威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的感人事迹。与会专家认为,《最后一站》是一部真实感人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不仅关注了乡村振兴的宏观进程,更深入到个体命运的微观层面,其文字接地气、聚人气、见形象、得精神,展现出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底和对乡村振兴事业的深刻理解。